

中国 智慧 箴言

弘博◎编著

七十九句箴言
妙析中华原典
浸淫历史五千年



人民出版社

中国 智慧 箴言

弘博◎编著

七十九句箴言

妙析中华原典

浸淫历史五千年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智慧箴言/弘博编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ISBN 978 - 7 - 01 - 012493 - 3

I. ①中… II. ①弘… III. ①中华文化 - 通俗读物 IV. ①K20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06236 号

中国智慧箴言

ZHONGGUO ZHIHUI ZHENYAN

弘 博 编著

责任编辑: 李 葳

封面设计: 久品轩

出版发行: 人 民 出 版 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邮 编: 100706

邮购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印 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16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01 - 012493 - 3

定 价: 28.00 元

著作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印制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 (010) 65258589

Contents | 目 录

导 论 汇聚中华传统智慧的正能量/ 1

易 经 自强求变的精神智慧/ 16

元、亨、利、贞/ 17

潜龙勿用/ 20

君子终日乾乾/ 23

飞龙在天/ 25

亢龙有悔/ 27

君子自强不息/ 29

君子厚德载物/ 31

无平不陂，无往不复/ 35

君子有终/ 37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39

君子以立不易方/ 42

君子自昭明德/ 45

君子以同而异/ 48

君子致命遂志/ 51

革故鼎新/ 54

论 语 仁义诚信的修身智慧/ 57

学而时习之/ 58

过则勿惮改/ 60

Contents 目 录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	63
礼之用和为贵/	65
君子好学/	67
贫而乐道，富而好礼/	69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71
君子不器/	73
见义不为，无勇也/	75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77
成事不说，遂事不谏/	79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82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84
修己安人/	86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88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90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92
 法 家 法、术、势并用的规则智慧/	94
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	95
制天下而征诸侯者，威势也/	98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	
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	101
法不阿贵，绳不挠曲/	104

Contents | 目 录

道私者乱，道法者治/	107
言无二贵，法不两适/	111
时移而治不易者乱/	114
七术/	116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	120
明君无为于上，君臣竦惧乎下/	123
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	126

兵 家 因变制胜的策略智慧/ 129

天时、地利、人和/	13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134
不战而屈人之兵/	137
上兵伐谋/	140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142
胜可知不可为/	145
以正合以奇胜/	148
激水漂石/	150
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	152
围师必阙，穷寇勿迫/	155
围地则谋，死地则战/	159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162

Contents 目 录

道 家 无为无不为的境界智慧/ 165

功成弗居/ 166

无欲不争，无为而治/ 168

天地不仁/ 170

上善若水/ 173

太上，不知有之/ 176

绝圣弃智，绝仁弃义/ 178

曲则全，枉则直/ 180

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183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185

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187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189

大音稀声，大象无形/ 192

大成若缺，大巧若拙/ 195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198

善用人者，为之下/ 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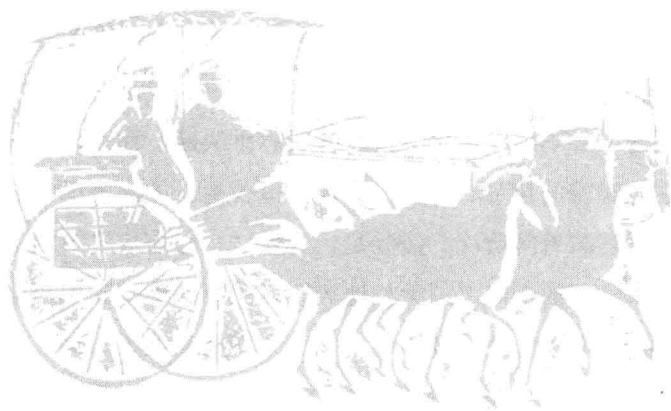
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 202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204

导 论

汇聚中华传统智慧的正能量

中国人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历经复杂多变的社会形态与生活方式，砺沙成珠，集腋成裘，孕育发展了丰富的人生智慧，其中不乏与现代竞争型社会相适应的思维逻辑与生存技巧。中国智慧箴言，溯源于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基因，融汇中国人集体文化意识中的那些经典思想、故事、神话、传说，解读中国人的行为习惯，熟稔于中国人的理想信念、修身处世、筹划方略等心理与思维定式。只有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形势，才可以在中国文化的觉醒中找准方向，不盲从，不悲观，真正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新路。从那些流传古今的经典语录、箴言故事中，中国智慧可以概括为以下特征：



一、易经：自强求变的精神智慧

中国文化经典中凸显人的积极主动与自觉理性精神的，首推《易经》。《易经》把天道与人事、自然与社会、天道运行规则与社会运行律令条陈罗列，强调二者的一致性和天人感应，主张从更久远的时间和更宏大的空间角度来思考社会与人事，追求人事与天命的协调一致，孕育形成了顺天应人、自强求变的智慧，包括：

“元亨利贞”的节奏意识。

“君子终日乾乾”、“履霜坚冰至”的忧患意识。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器宇轩昂、果敢刚毅、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服牛乘马、引重致远的配合意识和孺子牛品格。

“君子同而异”，识大体存不同，坚守差异与个性的独立意识。

“君子自昭明德”的一身正气；面对困难“致命遂志”的坚韧。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革故鼎新”的变革创新意识。

.....

易经作为中国古代先民卜筮未来吉凶、辅助决策的经典，确立了在“天人相通”、“天人合一”、“天人和谐”基础上的决策模式。先民遇到困难犹豫不决时，都会问龟问蓍。先民之所以选择龟骨蓍草回答所问的问题，并不因为先民相信龟蓍能思维决断，而是因为先民把龟蓍看作古老经验的化身、神秘的象征。龟蓍生长的时间都很长，生长的时间长就意味着阅历深、经验足，自然“言必有应”。在先民看来，天地是最有经验的耆旧（“天长地久”），社会人事变动都可以通过龟兆蓍数卦象问卜于天地诸神。卜人、巫人就是沟通天、地、人之间联系的桥梁，卜筮这一文化现象固化了“天人相通”、“天人相应”的集

体意识，反过来，“天人相通”、“天人相应”的集体表象和集体意识又强化了“顺天应人”决策模式。

天、地、人相互渗透、相互贯通的关系，在中国人的集体意识中早已根深蒂固。西方人崇敬人格化的神，并引以为宗教支点，认为中国人少宗教信仰，没有“敬畏感”，故而没有规则意识。殊不知，“敬天悯人”的文化尊崇，不只渗透在中国人宗教意义上的本体生存意识中，而且经由文化传承，其天、地、人之互通转化的关系，已由先民原初的混沌感悟上升为后人理性的认知，成为中国人普遍接受的理性思考法则，表现在决策、管理的方方面面。从国家、社区、企业组织到管理干部、普通员工，都有一部天地人的层次关系和逻辑秩序。例如，就企业层面讲，最高层是“天”，基层员工是“地”，中间层便是“人”，中间层需要顺天应人，沟通上下，担起自己的职责。换一个角度，换一个岗位，任何一个员工又在各自的岗位面对自己的“天”、“地”，担当起“人”的责任。这样一种尊重个体内在世界的管理文化，凸显的是经邦济世弘扬个性、心怀天下以人为本的管理法则。

中国人讲究“变”，追求“变”，善“变”。从中国人奉为文化圭臬的天人合一观视角看，人在天地的体系中处于中间层，需要顺应天地五行的变化适时而动。这并不是说人就是消极被动的，恰恰相反，如何掌握时机，抓住天地运行规律，促成变化非常关键。变还是不变？何时变？如何变？在天地人的体系中，人既是主体也是客体，既有主动性也有被动性。从客体转化为主体，由被动转化为主动，就是变的规律。处于优势的时候，希望不变；处于劣势的时候希望变，这是人之常情。易经把这个变化与天地运行法则结合起来，揭示人事变动的规律性，将人的自在状态提升为自为状态，为人的积极有为自我管理提供了根据。从“潜龙勿用”、“终日乾乾”到“飞龙在天”、“亢龙有悔”，人的各种状态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在困难的时候不失信心，谋大业注重配合，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正是因为有突破困局、

开拓、创新、进取精神的支撑。中国人的自我管理、永不放弃的精神节操，告诫中国人常怀忧患责任意识，乐不忘忧，奋发砥砺，自强不息。

二、论语：仁义诚信的修身智慧

中国人不求为圣人，但求为君子。德才兼备者是圣人，德胜于才者是君子，有才无德者是小人。圣人是时代的楷模，是先天的造化与后天的教化之和諧统一。圣人德足以服众，才可以安邦，其才能高低多少与先天基因和环境有关，非一般人可以得到。德则不同，由后天修养教化而成，是个人心性修炼的结果。只要付出努力，完善品德，人人都可以享有君子的荣耀。与小人的无德相比较，君子 and 圣人有一个共同点，都追求道德的完善，故而人们常常把圣人君子放在一起来说，表现了中国文化对修身的重视。中国较早的政治经典《尚书·洪范》中已出现大量关于人格的论述。而对中国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影响深远的，要属《论语》。《论语》中有关人格修炼的精辟阐释，为历代君王、豪杰，乃至普通百姓所推崇、期盼、信奉。它要求圣人君子付出爱心和耐心，以身作则，其行为就能被效法，其号令才得以执行，圣人君子才可以赢得尊重，达到“以德服人”的目的。

《论语》的修身智慧可以概括为“仁义礼智信”。

何谓仁义诚信的人格？子路、子张向孔子问政、问仁的对话，作了详细解释。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论语·子路》）“先之劳之”，“无倦”，意思是服务大众，忠于职守，勤政爱民，任劳任怨。“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把恭、宽、

信、敏、惠五个方面，即恭敬自重、宽宏大度、诚实守信、勤劳敏捷、慈心施予，作为“仁”的内涵。孔子所说的“仁”，是针对有禄位的诸侯、卿、大夫、士来讲的，是对圣人君子的人格要求。孔子所说的，君子不重则不威，要求君子庄敬自重，才有威严，不会遭致侮辱；君子忠厚宽容、有大气度，有包容性，才会得到大家的拥戴；君子诚信无欺，才会得到任用；君子勤劳敏捷，办事效率高，贡献就大；君子施恩惠予人，才能用人。

怎样才能修得君子的人格呢？主要是“和而不同”和“执两用中”。孔子说“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和”既不是“同”，也不是“不同”。中国文化重视天、地、人、物、我之间的和谐统一关系，不只在宏观的宇宙之间，也存在于人和每一个细小个体的内在世界中。如果只做到了宏观的“大一统”而没有微观的个体“和谐”，还只能是“和”而没有“不同”。中国文化既有从宇宙自然的宏观视角审视社会人事关系的和谐统一要求，也有从个人出发反观天地万物的“不同”思维。所谓推己及人、仁民爱物的整体观就是如此。《中庸》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说，人的喜、怒、哀、乐等感情没有发作的时候，叫作“中”；发作出来而能合乎礼节叫作“和”。“中”是天下最重要的根本，“和”是天下通行的道路。将“中和”的原理发挥到极致，天地秩序井然，万物的生长茂盛。所以，追求“和”或“中和”，是人生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君子需要通过“和”的实践达到理想与现实的统一。

“和”在整体上的和谐一致物我相通，不排除对立和偏反，但中国文化把这种对立和偏反视为整体和谐的一部分，如《礼记·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周易·系辞传》：“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宽容、平和、兼收

并蓄、博大恢宏的品格，正是和谐辩证运动的要求。中国文化所表达的自然与人文和合，人与万物和合的追求，都在“和”的追求中融汇。

“中”指中道，“无过无不及”，不偏不倚，即适度。事情做过头了，做过头了，或者做得还不够，达不到标准，都不好。孔子说，“过犹不及”，又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快乐而不放荡，悲哀而不痛苦，就是“中”的尺度、标准。承认矛盾、偏反、对立，又不走极端，追求动态的平衡、整体的和谐，是完善人格的保证。孔子有“叩其两端”之说，意思是如果有不明事理的人来问我问题，我就从首尾两端去盘问，从中发现矛盾，然后把问题综合起来予以回答。《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庸”在这里是“用”的意思。这就是所谓“执两用中”的方法论。“执”就是把握。“两”就是统一体中对立的两个方面。这种方法论主张把握事物中相互对立的方面，运用无过无不及的中庸原则行事。中和、中庸的原则，传承了中国文化的整体和谐观。

“中庸”、“中和”、“执两用中”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最普遍的方法论的意义。大自然阴阳平衡，相辅相成，不偏向任一极端。中庸的方法吸纳了天地自然对立调和、互动互补的原则，并以之调和人类自身与天地、与万物的关系，达到中和的境地，使天地万物与人正常地发展。因而，中庸之道又是人间之道，可以调节伦常关系、社群关系。中庸辩证法强调矛盾对立的中和，使两端都可以同时存在，都可以保持各自的特性，促进两端彼此互存、互动、反应、转化。在多数情况下，矛盾统一取中和的状况，既有矛盾、偏反、对立、斗争，同时彼此渗透，共存共荣。中国文化不喜欢偏执，因为偏执一端会损害天地间整体和谐和人事间仁义礼乐综合的大道，只看到一个片面，而废弃了其余多个方面。“尚中”、“执中”的方法，对“过”与“不及”之两端持守动态统一，使各种力量与利益参和渗透、相互补充，在大

小、刚柔、强弱、疏密、疾徐、高下、动静之际保持弹性，具有一种节奏感，体现了君子对待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的和谐智慧。

三、法家：法、术、势并用的规则智慧

春秋战国时期，王权式微，诸侯争霸，社会动荡不宁。在不同势力竞争较量的过程中，秦王朝的崛起，使法家思想逐渐占据优势，得到普遍认同。法家的杰出代表人物首推韩非子，他融汇并发展了道家、荀况以及商鞅、管仲等人的思想，强调法、术、势相结合，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法家主张以“法”为核心，将“法”、“术”、“势”即制度、技巧和权威的作用巧妙结合，用事先规定好的不变的规定、律令管理人事，强化法律的威严和检查的力量，确保每个人在各自的岗位发挥最大的工作效率。与儒家不同，法家明确主张“法治”，反对“人治”，认为社会的管理应该符合既定的法令和规则，而不是只依赖君王的主观判断和个人好恶。法家相信，如果依靠规则和制度，即使平庸的人也能做好管理，相反，如果抛开了规则和制度，即便优秀的人才，也无法保证管理的成效。当然，法家也看到了“法”的局限，认为仅仅有管理制度，没有强力、灵活的推行手段，也不行。所以，管理技巧和管理权威也是十分必要的。法家较少关注领导者的人格修养和社会的伦理准则，更多地思考管理制度和权术手段，其有关组织制度、职位设置、人员的选拔和授权、监督、考核等方面，为社会管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和范例。用“儒家的心肠，法家的手段”来管理被认为是中国式管理的最佳状态。

法家强调社会治理的关键在于法律、法令或制度，其法治的基本内容又以赏罚为基础，这与法家对人性的认识是分不开的。法家继承了荀子的人性恶的观点，并作了进一步发挥。认为，人有贪财嗜利的

本性，人的一切行为计算最终都以利益交换为考量。韩非举例说，父母没有优抚子女，子女长大后抱怨；儿子成人后不供养父母，父母也会失落。至亲之间的这种情感，根源于“利己”的利益算计。同样，雇主供给佣客好吃好喝，不是因为爱，而是要换取其尽心劳作；佣客辛勤耕耘，不是因为爱雇主，而是为挣得更多报酬。以人性自利为根据，法家所有制度设计都以赏罚为基础。商鞅概括为：“民勇，则赏之以其所欲；民怯，则杀之以其所恶。故怯民使之以刑则勇，勇民使之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必王。”（《商君书·说民》）韩非则将其概括为赏罚得当，即“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则罚，非罚小功也，罚功不当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罚，非不说于大功也，以为不当名也害甚于有大功，故罚。”（《韩非子·二柄》）赏罚制度的确立，可以保证职责对应，防范冒功饰过。韩非极力推崇建立在赏罚基础上的严刑峻法，认为“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所以“威势可以禁暴，而德厚不足以止乱也”（《韩非子·显学》）。在赏罚基础上，把制度规则与威权、管理技巧紧密结合，构成了法家治国理政的理论体系。以赏罚二柄为法治的基本内容，以君主的威势作为制度的保障，通过一整套驾驭臣下、防范僭越、保障君主势位的管理技巧，法家确立了“以法治国”的理念和操作体系。法家的制度与威权并用的思想流传深远，后世的统治者，用法令把臣民置于违法或者有罪的状态之下，然后以宽赦的方式取得臣民的服从和忠诚，在法律之外，为威权留下操作空间，贯彻的正是法家的思想。

法制具体运用的一个关键手段是“术”，“术”的运用是为了保证君主不被蒙蔽和控制。韩非列举大量事例说明人与人之间不能有信任，比如为了权势，父子可以相残，夫妻可以反目。君王要想不被蒙蔽，就要将自己的好恶隐藏起来不轻易显示，因为臣下一旦知道君主的欲望和意见，就会顺着这种欲望和意见讨好君主以致操纵君主。

“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就是君主应对臣下之术。但是，君王对臣下不仅要防范，还要让臣下治国，因而必须拿捏得当，用臣下之时示之以信任，控制臣下之权时施加重手，“用人不疑”与“天威难测”交替使用。君主用术，就是为了不让臣下蒙蔽君主，更不能让臣下控制君主。

韩非所说君主之术有七种，“七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所谓“众端参观”，是指以多种信息渠道、多个信息来源互相参验，以求掌握真实情况，不被臣下蒙蔽。所谓“必罚明威”，是指严刑重罚，防止仁爱和不忍之心致乱。以救火为例，与其赏救火者，不如罚不救火的观望者更有效。所谓“信赏尽能”，是指赏赐的力度要大，这样才可以激发人们付诸最大努力。所谓“一听责下”，“一听”是指区别愚智，如齐宣王和齐湣王听竽之不同，用来驱逐南郭先生；“责下”是指以事参验臣下所为，把握臣下的真实状态。所谓“疑诏诡使”，是指以诈术检测臣下，用计谋表达天威难测。所谓“挟知而问”，是指借助信息不对称显示君主的超人神通。所谓“倒言反事”，是指故意用错误信息诱导臣下，看其反应，察其忠奸。韩非所说的“七术”，只是君主权术的一部分，其关键是君主牢牢控制臣下，只要能够控制臣下，可以无所不用。

韩非所说的术，如果撇开价值判断，单纯从管理技术角度看，其中一些技巧性、策略性的方法是管理活动所必不可少的。然而，任何政治统治和管理技术，都有目的和手段的关系问题。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这是韩非法治思想的致命伤。

法家所谓的法制，与现代意义的法制不同。法家虽然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但法家的制度，其正当性、合法性来源于君主，把法的功能局限于对臣子和百姓的控制，与儒家立足于习俗的礼制相比，其制度

设计存在严重的合理性偏差。法家在人性恶基础上的制度体系，从功能上讲，只能惩恶而不能扬善，最终泯灭人生观中向善的个体价值，弘扬君主专权的天下观。法家重惩罚轻奖赏，如果奖赏与惩罚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奖赏是对人的主动性的认可，而惩罚是对人的主动性的剥夺。所以，基于法家思想的制度设计强调的是泯灭个性的统一体价值，而非鼓励个人自由、自我追求的竞争意识，其最终结果必然导致君主的集权和百姓的无权，强国和弱民并存的局面。

正因为法家法术势并用的手段有利于统治者积权聚势，法家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即便后世思想家用儒、道、释将其伪装，还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为当政者服务的实用性、功利性目的。

四、兵家：因变制胜的策略智慧

中国古代兵家的诸多论著虽然针对军事，但其中蕴含了丰富的战略、策略设计，对人际交往、谋事筹划乃至经营管理都有重大参考价值。日本管理专家村孚先生说，日本经济发展好的时候学习美国的管理方法，而在经济面临困难的时候学习中国兵家的策略，以摆脱经营的麻烦和困境。西方不少管理学经典高度关注兵家的管理精神和方法、策略。如雷恩（D. A. Wran）的《管理思想演进史》、郝启特（R. M. Hodgetts）的《企业管理》、孔茨（Kootz）和奥唐奈（C. O. Donnell）合著的《管理学》等。兵家讲究运筹谋划，强调管理者要审时度势，对外界环境和组织内部有清醒认识，据此作出正确判断和决定。兵家提出“因变制胜”，强调内外环境之“变”对决策的影响，要求管理者对各种变化及时作出反应，并能积极创造变的因素，时时处处占据主动，不受制于对手。《孙子兵法》完整系统地反映了兵家的智慧和思想，其因变制胜的策略智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